

從考古資料看蘭嶼雅美人的祖源問題*

臧振華**

中文摘要

蘭嶼與菲律賓巴丹島距離相近，而且居住在蘭嶼島的雅美(達悟)人與居住在巴丹群島的人，無論是在語言、文化或社會特徵上都有相似之處，研究蘭嶼的語言學者、人類學者和考古學者大都認為兩者之間有密切的歷史關係，甚而蘭嶼的雅美人都是來自巴丹群島。這一說辭，雖然幾乎是異口同聲，然而以目前蘭嶼所發現的考古資料，包括甕棺葬和陶、石器的類緣關係來看，似乎還有商榷的餘地。從本文的討論可知，近代的雅美人，從語言和文化上來看，固然不能完全排除是晚近從巴丹島移民而來的可能性，但是我們也不能忽略一個考古資料所反映的事實：蘭嶼島遠從4000年以前的繩紋紅陶時期開始，即已有人從台灣本島前來活動，以後從3000多年前開始，卑南文化的人除了到達蘭嶼和綠島，也可能繼續向前延伸到巴丹群島，而台灣東海岸新石時代的甕棺葬俗也可能影響到了台灣外海的綠島、蘭嶼和巴丹群島，並持續在當地發展成為鐵器時代的甕棺葬文化。因此，筆者推測，蘭嶼和巴丹島的史前居民至遲在三千年前可能共同來自於台灣的東海岸。這些人群的全部或部分，有可能即是今日蘭嶼和巴丹島民的祖先。

關鍵字：蘭嶼，巴丹群島，雅美人，達悟人，甕棺葬。

前 言

蘭嶼與菲律賓巴丹群島距離相近，而且居住在蘭嶼島的雅美(達悟)人與居住在巴丹群島的人，無論是在語言、文化或社會特徵上，都有相似之處；此外若干雅美族部落都有祖先乘船從其他島嶼遷來的傳說（余光弘、董森永 1998），加上直到十七世紀，雅美人和巴丹群島之間還常有接觸的事實（de

* 本文初稿寫於2003年6月，是慶祝宋文薰教授八秩華誕學術研討會之論文。筆者第一次到蘭嶼作考古工作是跟隨宋文薰老師去的。那是1978年。當時在距漁人和紅頭部落不遠處的Lobusbussan遺址發掘甕棺的情景至今猶歷歷在目，然時間忽已過了20餘年。欣逢宋老師八秩嵩壽，特撰此文，以為慶賀。

**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館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Beaculair 1957），因此研究蘭嶼的語言學者、人類學者和考古學者大都認為兩者之間有密切的歷史關係，甚而雅美人都是來自南方的巴丹群島（Asai 1936；鹿野忠雄1946a，1946b；de Beauclair 1959；Benedek 1991）。1998年，蘭恩文教基金會所舉辦的「蘭嶼巴丹尋根文化之旅」，再度引起大眾對於兩地淵源關係的興趣。然而，這個問題在學者間其實還有不同的意見。費羅禮（Ferrell 1969）即曾指出：在過去，由於學者強調蘭嶼與巴丹群島之間密切的關係，以致忽略了其與台灣島之間也可能存在的任何關係；此外，由於蘭嶼和巴丹群島上缺乏充分的考古學資料和研究，使之無法藉以瞭解近代雅美人是否都是從巴丹群島遷移而來的？還是源自蘭嶼島上的古代族群？抑或是上述兩種可能性的結合。所以，無論從比較蘭嶼與巴丹群島的語言和文化、社會特徵，或爬梳神話傳說，甚或進行「尋根之旅」，缺少了考古資料，似乎都難以為這些問題找到一個比較清晰的答案。本文的目的即是要檢視蘭嶼及其周邊台灣和巴丹群島相關的考古資料，看看能否為蘭嶼雅美人的祖源問題提供些許新的線索。

蘭嶼的考古工作

蘭嶼的考古工作甚為零星，早在二十世紀之初，日本人大野延太郎（1901）和河村只雄（1939）先後報導在蘭嶼所發現的石斧。英國人類學家 Edmund R. Leach（1938）也曾報導蘭嶼的石器。而自日本學者鹿野忠雄（1946b）於1935年在蘭嶼紅頭村進行了甕棺葬的調查之後，甕棺葬便成為蘭嶼最顯著的考古材料。此後，甕棺葬在蘭嶼出土就時有所聞。1969年，在椰油村蘭嶼國中的校園中因為工程施工出土了數個甕棺。鮑克蘭（Inez de Beauclair）於1972年曾為文報導；除了甕棺，在其中還發現玻璃珠、玻璃環和陶罐等。

1977年，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的Richard B. Stamps（尹因印）首次較有系統地在蘭嶼作了調查，發現遺址22處，包括歷史遺址、傳說之舊聚落址、農業活動遺址、洞穴遺址和墓葬遺址。他在漁人和紅頭部落中間，漁人溪口左岸海階的Lobusbussan遺址，記錄了因修築公路所出土的五座甕棺葬，並發掘了其中的1號和4號甕棺。1號甕棺內除1片陶片，空無一物；4號甕棺出土1件貝器和291塊人骨。由人骨所做的兩個碳14年代，分別為：1170+/-145 B.P.和460+/-600 B.P.，但Stamps認為後者的樣本有問題，並不可靠（Stamps 1979）。

1978年8月，由宋文薰所帶領的台灣大學考古隊，在同一地點，又發掘出大小二座甕棺葬（宋文薰1980），其中沒有人骨和遺物，但發現有人牙碎屑。1979至1982年間，徐韶謨（2003）與若干日本學者在蘭嶼國中一帶進行數次調查，在地表和土層中又先後發現了至少四個大破陶罐，以及一些陶片、中國磁片、玉器（廢料和玉環、玉核等）、玻璃珠和石器（石刀、石斧、石鏹、石錘和網墜等）。此後又有日本人米澤容一（1984、1986）在蘭嶼作了考古調查。到了1986和1988年，陳仲玉等（1989）為進行「蘭嶼國家公園」文化資產調查評估，依據Stamps和米澤之資料，在蘭嶼進行了全島性的考古調查，確定了51處遺址的地點，其中「屬於史前遺址者三十三處，甕棺葬墓地有三處，傳說中有石器或墓葬的出現地點有六處，近代或傳說的廢村遺址有九處。」1997年，葉美珍因執行臧振華所主持內政部「台閩地區考古遺址普查計畫（第四期）」，負責在蘭嶼進行考古遺址普查，表列遺址45處，主要為前人所發現之遺址，新發現遺址1處（臧振華、葉美珍 2000）。

2001年劉益昌等執行台東縣政府「台東縣史前遺址內涵及範圍研究」計畫，在蘭嶼調查遺址47處，



圖1. 筆者在蘭嶼國中所發現的甕棺殘跡。

A broken burial jar found at the Lanyu Junior High School, Lanyu.

其中新發現遺址 2處（劉益昌等2002）。2001年12月臧振華和菲律賓國立博物館的Eusebio Dizon、Rey Santiago 和Jose Santiago以及中央研究院「呂宋島北岸考古調查計畫」研究助理洪曉純到蘭嶼調查，除了在紅頭村東南方約3公里處的「青青草原」發現古代聚落遺跡，以及在其附近發現石器殘片之外，並在蘭嶼國中巧遇該校溝渠工程施工中挖出了甕棺葬（圖1）。筆者等對於此一被工程破壞了的甕棺葬進行了必要之處理，清理出人類骨骸和許多橘色之小型玻璃珠約200顆。人類骨骸經過碳14測定結果，其年代為1200+/-40 B.P.⁽¹⁾。

上述這些考古工作顯示，蘭嶼至今已發現到四、五十處史前遺址，但是經過發掘的則只有 Lobusbussan的甕棺葬一處，其他都僅是做了地表調查和採集。所採集的遺物，據各個調查者的報導，主要為陶器和石器，在若干遺址還發現了橘、黃、紅褐、藍等色的玻璃小珠、玻璃手鐲、瑪瑙珠飾、

(1) 依據美國華盛頓大學碳14實驗室樹木年輪校正程式4.2版校正後之年代為A.D. 815.

玉耳飾、和瓷器等。陶器的類別大多為容器之破片，有少數陶紡輪。陶片主要為夾細砂或粗砂的紅褐色陶，多為素面無紋，少數有波浪形之刻劃紋和圓圈形之戳印紋。石器的類別有石斧、石錘、磨製矛頭、凹石、石紡輪、網墜和砥石等。

關於這些文化遺物的類緣和年代，目前還不十分清楚。臧振華、葉美珍（2000）將蘭嶼島上普遍發現，並與甕棺共存的素面紅褐陶為代表的文化統稱為「雅美文化」，認為是雅美人祖先的文化，估計其年代在距今2000至600年前間。劉益昌等同樣認為它們是雅美族祖先所留下的文化，只是他們以Stamps所發掘的Lobusbussan來稱呼此一文化（劉益昌、顏廷序 2000）。而陳仲玉等（1989）也認為蘭嶼所發現的古文化很可能就是今日雅美族祖先的遺留。

不過，在蘭嶼所發現的陶片中，也有極少數較為特殊者。葉美珍報導在紅頭第一遺址發現「繩紋紅陶片」，明顯與素面紅褐陶有異，她據以判斷該遺址有兩層文化，上層為「雅美文化」，下層為「繩紋陶文化」（臧振華、葉美珍 2000）。劉益昌在朗島 I 和紅頭村的Dorikriyaranom分別發現了「卑南文化」和「東部繩紋紅陶文化」兩類陶片，在蘭嶼機場發現了「卑南文化」的陶片，在東清村的情人洞發現「東部繩紋紅陶文化」的陶片（劉益昌等 2002）。

所以，依據目前的考古資料和考古學家的意見，蘭嶼的地下似乎可能至少包含三個考古學文化的遺存，即：以素面紅陶和甕棺葬為特徵的「雅美文化」、「卑南文化」及「繩紋紅陶文化」或「東部繩紋紅陶文化」。目前雖然還沒有發現這三者在地層上的疊壓證據，但是依據台灣東海岸的史前文化層序推知，其年代順序應該是「繩紋紅陶」最早，「卑南文化」次之，「雅美文化」可能最晚。至於它們彼此間的關係如何？則還有待進一步研究。而「繩紋紅陶文化」與「卑南文化」的關係，更需要到蘭嶼之外的台灣東海岸地區來找尋答案。但是單就所謂的「雅美文化」而言，至少有兩個基本問題還需要釐清：1.「雅美文化」和現在的雅美人之間，究竟是否有著傳承的關係？2.「雅美文化」的年代和來源為何？

對於這兩個問題，Stamps (1983) 認為蘭嶼的甕棺葬與巴布煙群島的甕棺葬頗為相似，顯示兩者在文化上的持續性，並符合蘭嶼人來自南方的傳說。陳仲玉等（1989）曾以蘭嶼島上的古文化與近代雅美文化之間在許多方面，如製陶、大船製造技術、金銀飾物等有相似之處，特別是近代雅美人記得他們祖先在若干代以前曾採用甕棺葬的方式，而認為以甕棺和素面紅陶為代表的「雅美文化」和現在的雅美文化之間有傳承的關係。劉益昌也採用Stamps的意見，以蘭嶼甕棺葬與菲律賓北部巴布煙群島的甕棺相同，符合雅美人來自巴丹群島的說法，以及雅美人的口碑說明在古代曾有甕棺葬的習俗這兩點，認為「這類甕棺葬當是達悟（雅美）人的祖先在史前所留下的文化。」所以，甕棺葬顯然成為探討近代雅美人與蘭嶼古代文化之傳承關係，以及雅美族人來源問題的關鍵性證據。為了進一步討論這兩個問題，筆者在下兩節中擬先就蘭嶼所發現的甕棺葬，討論其與近代雅美族及蘭嶼週緣地區的關係。

甕棺葬與近代雅美人之間的關係

目前在蘭嶼已經發現了好幾處的甕棺葬遺址，但是見於考古報告的只有三處；主要分佈在紅頭村和椰油村一帶，包括紅頭村附近的Lobusbussan 和Rukavgiran，以及椰油村蘭嶼國中運動場南側的

Rusarusol。此外，據說在蘭嶼一些道路或公共工程之施工，甚而聚落內興建家屋，也偶而會挖出甕棺，不過皆不見於考古報告。所以，在蘭嶼的地下必然還埋藏著一些甕棺。關於這些甕棺之形制，由於無論是考古發掘或工程施工中之發現，大都破碎而無法窺其完整的器形，僅有鹿野忠雄（1946b）對紅頭村聚落內所發現的一個甕棺描述得最為詳細。該甕棺呈現圓桶形，紅色無紋口緣狹小，高約60公分，內側底徑約55公分，腹部外側約170公分，甕壁厚約2公分。在這個甕棺之上，還有一個相同陶質的蓋子，壁厚同樣約2公分，為平鉢形，其內側有陰刻的幾何紋或波浪紋。Stamps在Lobusbussan所發掘的甕棺為橘黃色，外表抹光，內壁粗糙，胎質夾砂，皆為圓底，並以覆著的陶罐作為蓋子，上面的陶罐口較大，下面的陶罐口較小，兩者上下扣合，甕棺周邊似有大型礫石分佈。

至於幾處甕棺內所發現的內容，除了少量腐朽的人骨之外，鹿野所報導的甕棺未見隨葬品。Stamps在甕棺中挖到一件貝器，而在蘭嶼國中的幾個破碎甕棺則出現一些橘黃色小玻璃珠。但據蘭嶼當地人告知，從一些未見報導的甕棺中還出土過金飾、玉耳飾、瑪瑙珠、玻璃手環和中國瓷器等。關於甕棺葬的年代，還不是很清楚。但以Stamps從Lobusbussan和筆者從蘭嶼國中所獲得兩個碳14年代的近似程度來看，距今1200年前應該是一個可以接受的年代。如以20-25年為一代，則甕棺葬的存在年代距離現代的雅美人至少約有50-60代之遙。

關於這些甕棺葬的主人與近代雅美族之間的關係，如就墓葬的形式和所反映的葬俗觀念、態度和禁忌來看，兩者之間實有明顯的差別。近代雅美人行土葬或棄屍葬，將死者視為惡靈，葬事戒慎恐懼、嚴守禁忌，埋葬地遠離部落，草草下葬了事（劉斌雄 1959）。這與以陶甕為棺，且棺內常放置珠玉陪葬品，反映對於死者懷念和尊敬的態度是截然不同的。雖然鹿野忠雄首先依據紅頭、野銀和漁人三社的傳說，推測近代雅美人的祖先可能曾施行甕棺葬，並推測較早的甕棺體型小，形似「煮壺」，是用來放置拾骨的甕棺，而較晚則改用大型甕棺埋葬屍體；到了大約距今400到275年前，甕葬之風習才被放棄；而其原因一方面是由於有了公共墓地而不需要將死者埋在家宅中或其附近，另外是由於甕棺形體太大，不便製造和搬運。不過，由於缺乏直接的證據，鹿野對於近代雅美人和甕棺葬人之間的關係，也不免感到疑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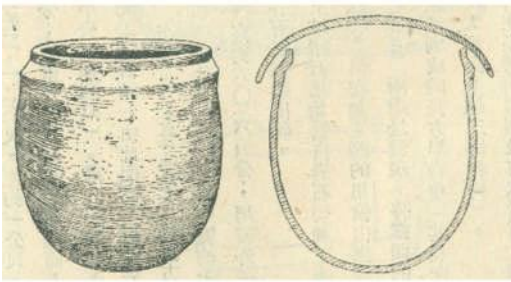
所以，依據雅美人的傳說來推斷甕棺葬和近代雅美人的傳承關係，就目前之資料來看，證據仍嫌薄弱。尤其葬俗和禁忌是一個文化中最不容易改變的部分，既使到了近代，雅美人幾乎都改信基督教或天主教，他們的喪葬習慣卻未因此而起顯著變化，並嚴格遵守喪葬的禁忌（劉斌雄 1959）。從這個角度來看，蘭嶼甕棺葬和近代雅美人文化之間似乎存在著明顯的斷裂性，而形成這種斷裂的原因，固然有可能是源於一個文化傳統發展過程中的變遷，但是也可能是代表先後佔居蘭嶼的不同人群，當然也不能排除是上述兩種原因的結合。

蘭嶼甕棺葬的類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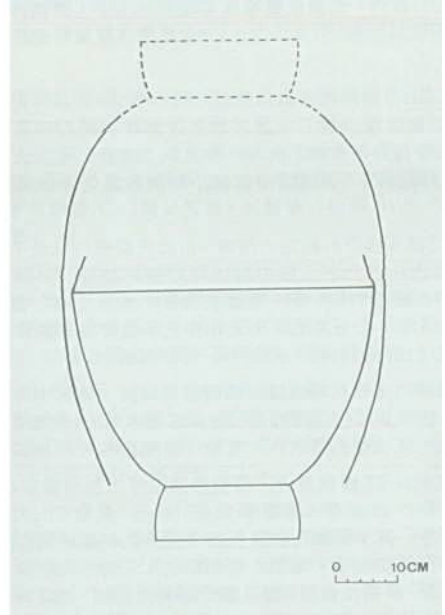
鹿野忠雄（1946）認為甕棺葬是蘭嶼與巴丹群島之間親緣關係的一項重要證據，他檢視並比較當時從巴丹群島和巴布延群島、菲律賓，以及印尼一帶所發現的甕棺葬，推論甕棺葬的習俗是源自菲律賓，經過巴丹和巴布延群島，傳到蘭嶼，再向北到達綠島和台灣的東北部。近來，白德澤（Benedek 1991）也以巴丹群島和巴比延群島上所發現的一些甕棺葬與鹿野和Stamps在蘭嶼所發現的甕棺葬作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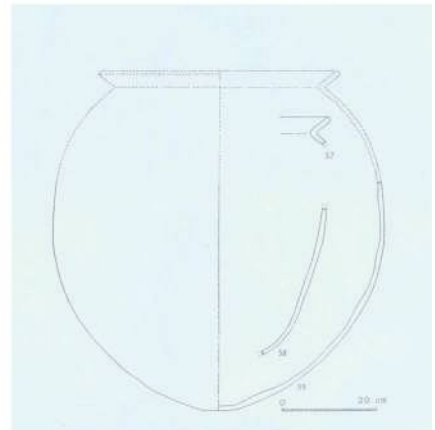
Stamps 在蘭嶼發現之甕棺
Burial jar discovered on Lanyu by Stamps.
(Stamps 1983)



鹿野忠雄在蘭嶼發現之甕棺
Burial jar found on Lanyu, reported by Tadao Kano.
(鹿野忠雄 1946b)



葉美珍在花岡山遺址發現之甕棺
Burial jar discovered at Huagangshan
by Mei-chen Yeh. (葉美珍 2001)



Koomoto 在巴丹島發現之甕棺
Burial jars discovered on Batan by Koomoto.
(Koomoto 1983)

圖2. 蘭嶼、花岡山和巴丹島所發現之甕棺。

Burial jars found on Lanyu, Batan and at the Huagangshan site, Hualien.

較，認為兩者在形制上相類似（圖2），顯示應屬於共同之起源，可總而稱之為「巴士文化（Bashiic Culture）」；而彼此分離之時間則是早在一千年前。換言之，白德澤認為蘭嶼雅美人的祖先早在一千年前即已與巴丹島分離，從南邊來到蘭嶼。他並且引用法國火山學家在巴丹島所獲得與甕棺出土地層相關的碳14年代資料，推測巴丹群島最早的甕棺年代是在距今2300年前左右。

鹿野和白德澤的意見反映了過去有關蘭嶼甕棺葬類緣的刻板印象。探討此一問題的學者大都將比較之目光集中在南方的巴丹、巴布延和菲律賓一帶，而忽略了蘭嶼島北方的台灣。其實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應是由於過去在台灣本島所報導的甕棺葬資料不多。國分直一（1981）雖曾列出若干早年在台灣發現甕棺葬的原住民部落和考古遺址，包括東海岸加禮宛、姑子律和新社的Torobian社，基隆的雞籠社等，以及高雄市的桃仔園、台南縣的湖子內、高雄縣的小岡山，以及花蓮市的花崗（岡）山等遺址；但是由於內容甚為簡略，未受到注意。誠如蘇爾翰（Solheim 1960）所說：東南亞的甕棺葬在形制和大小上有很大的變異性，在沒有能夠更好掌握時間因素和更詳細的資料之前，就考慮甕棺葬的分佈及其與人群移動的關連，可能會導致錯誤。

近年來，由於台灣各地出土甕棺葬的資料逐漸增多，使得我們有了得以與蘭嶼比較的資料。目前在台灣所發現的甕棺葬，可以早到距今4000年前左右的繩紋紅陶文化（出土於台南科學工業園區之右先方遺址）。其甕棺是以紅色無紋陶製做，長筒狀有蓋，專為放置夭折的嬰兒（臧振華等 2004）。這也許是包含台灣在內的島嶼東南亞地區迄今所發現最早的甕棺葬。在台灣北部，年代約在距今3千至2千多年前的芝山岩遺址圓山文化層，也曾發現甕棺葬。筆者在芝山岩遺址採集到已經破碎的甕棺葬，內有骨骸以及玉玦和玉管珠等陪葬品。其後，在台南科學工業園區內的大湖文化遺址（北三舍、三抱竹和五間厝下層）也發現了甕棺葬，主要是放置嬰兒的遺骸。甕棺的形制可分三類，一為將遺骸放入完整的圓底鼓腹扁圓小口的黑色陶罐內，口部以大塊陶片或折緣盆覆蓋；第二類是以兩個大的弧形陶片相互扣合，將遺骸置於其中；第三類則僅是以大陶片覆蓋遺骸（臧振華等 2004）。該文化的年代約在距今2500年前左右。此外，據國分直一和金關丈夫（1990:79）之報導，王鴻博曾在南投之東埔發現箱式石棺和甕棺，但形制不明。

台灣東部，花蓮的花岡山、鹽寮、大坑和長光等遺址，以及宜蘭的丸山也都先後發現了甕棺葬。花岡山遺址在日據時代即已被發現，1929年宮本延人（1973）曾作了小規模的發掘。1947年金關丈夫和國分直一在此遺址發現三座甕棺之殘跡（Solheim 1960，國分直一 1981）。葉美珍（2001）等人於1992年在花岡山遺址的發掘中再度發現四座甕棺。依據她的描述，花岡山甕棺的基本型式是帶肩和圈足的大陶罐，高度約60-80公分，直徑約50-60公分。棺蓋分為兩種形式，第一種為將陶罐之口緣打掉，上覆以扁平礫石或礫石片，第二種則為使用一倒覆的陶罐扣合（圖2）。棺中有人骨殘留，偶有石鐮作為陪葬品，大棺葬成人，小棺葬兒童。鹽寮遺址出土五座甕棺，形制與花岡山類似，基本上是埋藏於由中大型礫石堆成的石穴中，以石鐮作為陪葬品。大坑遺址發現兩座甕棺，形制亦與花岡山相類。葉美珍將這三處遺址都歸屬於同一個花岡山文化，估計其年代約在3000-1500年之間，但是劉益昌等（2000）將之放在距今3500-2000年間。宜蘭丸山遺址出土的甕棺是由一個平底大口甕和一塊扁平的頁岩石板所組成，內有兩件人獸形玉玦作為陪葬品。劉益昌（1996）將這一遺址的年代訂在距今2500年前左右，與花蓮之花岡山文化、台東的卑南文化和台北之圓山文化之間都有文化類緣關係。此外，在台東外海的綠島，可能也曾發現甕棺（安倍明義 1933），但缺乏較清楚的資料。

上述這些出土甕棺葬的遺址都屬於新石器時代，至於年代在公元紀元以後的鐵器時代遺址，目前只有在台中縣清水發現一個可能屬於鐵器時代番仔園文化的甕棺（聯合報87年3月13日消息），而在東海岸地區則尚未發現。至於進入近代原住民時期，除了前述加禮宛等部落傳說採用過甕棺葬；據馬淵東一記載，宜蘭縣的噶瑪蘭族曾施行甕棺葬，如羅東區的佳禮宛社，將屍體放在叫作Poroku的罐子裡埋葬，罐底開孔，並有蓋。最近在台東初鹿村工程整地時挖到甕棺，棺內有蹲踞式骨骸，還有銀製手鐲與陶珠等配飾，年代約一百年前（聯合報93年7月14日）。

比較蘭嶼與台灣的甕棺可以發現，台灣西部繩紋紅陶與大湖文化時期的甕棺主要是用於埋葬嬰兒，而其在形制和大小上，亦有別於蘭嶼的甕棺。但是台灣東海岸花岡山文化、丸山和晚近原住民的甕棺，在使用、形制、陪葬物和大小等方面，基本上與蘭嶼的甕棺確有相似之處，例如，甕棺係以覆陶罐或以大陶片為蓋，並有以礫石圍繞者。所以，蘭嶼的甕棺固然與巴丹和巴布延群島的甕棺類同，但是其與台灣東海岸史前甕棺的相似性，同樣值得注意。那麼單就甕葬之習俗和葬具之形制而言，蘭嶼的甕棺就未必然是源於南方的巴丹島，也有可能是來自於北邊的台灣東海岸。這三地之間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歷史關係？如果將年代學的因素加以考慮排比，則上限年代明顯較早的台灣甕棺葬習俗，有無可能是蘭嶼、巴丹和巴布延甕棺傳統的共同源頭？筆者推測，花岡山、丸山等遺址為代表的台灣東海岸甕棺葬文化極有可能在3000到2500年前傳到蘭嶼和巴丹群島一帶，並繼續在當地延續發展至鐵器時代。這樣的推測，似乎也受到下節所述其他考古資料的支持。

其他與雅美人祖源問題相關之考古資料

如前所述，蘭嶼迄今所發現的考古資料，主要是來自地表調查和採集，遺物除了甕棺，主要是陶器和石器，其他還偶有玻璃小珠、玻璃手鐲、瑪瑙珠飾、玉耳飾和盜器等。

陶器大多為容器之破片，陳仲玉等（1989）分析536件陶器碎片，在胎質方面絕大多數（96%以上）為細砂陶，粗砂者僅佔3.17%。在器表顏色方面，紅陶系，佔82.28%，灰陶系佔17.35%，其餘為帶釉陶器。在全部標本中，有63.62%是有表面敷泥抹平者，帶花紋者只有五件。第一件為壓印之帶狀舞蹈人形紋，第二件為方格印紋，第三件為類似拍印繩紋，第四件似為刻劃之凹道紋，第五件為在殘破陶紡輪頂面沿週緣及連接中心到邊緣之直線施以雙排刺點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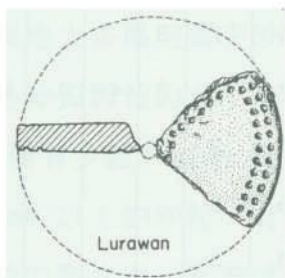
這些陶片都是地表採集，雖然過去學者依據目視觀察和比對，概略推測其中可能包含「雅美文化」、「卑南文化」和「繩紋紅陶文化」的三類陶片，但是由於缺乏地層關係和絕對年代之基礎，難以作確切的判斷。不過，在陳仲玉等所發現三件帶文飾之陶片，確實可以在台灣東海岸找到完全相似者。第一件之帶狀舞蹈人形壓印紋和第二件之方格印紋都見於李坤修（2005）所發掘屬於鐵器時代三和文化晚期（約在1300-1200 B.P.）之舊香蘭遺址，而第五件之陶紡輪上的刺點紋，則見於年代大約在3500-2500 B.P.之卑南（連照美、宋文薰 1986；葉美珍 2005）和鹽寮（葉美珍 2001）等遺址。此外，米澤容一在朗島部落Jikanyuan 遺址所發現的一件帶繩紋的陶器口緣，亦與台灣東海岸之繩紋紅陶甚為相似（圖3）。這四件文飾提供了蘭嶼史前陶器與台灣東海岸新石器和鐵器時代文化類緣關係的具體線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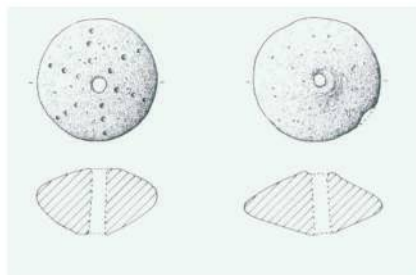
蘭嶼 (Lanyu) Labaltz
(陳仲玉等 1989)



舊香蘭 (Chiu Hsiang-lan)
(李坤修 2005)



蘭嶼 (Lanyu) Lurawan
(陳仲玉等 1989)



卑南 (Peinan)
(葉美珍 2005)



蘭嶼 (Lanyu) Jimalasin
(陳仲玉等 1989)



舊香蘭 (Chiu Hsiang-lan)
(李坤修 20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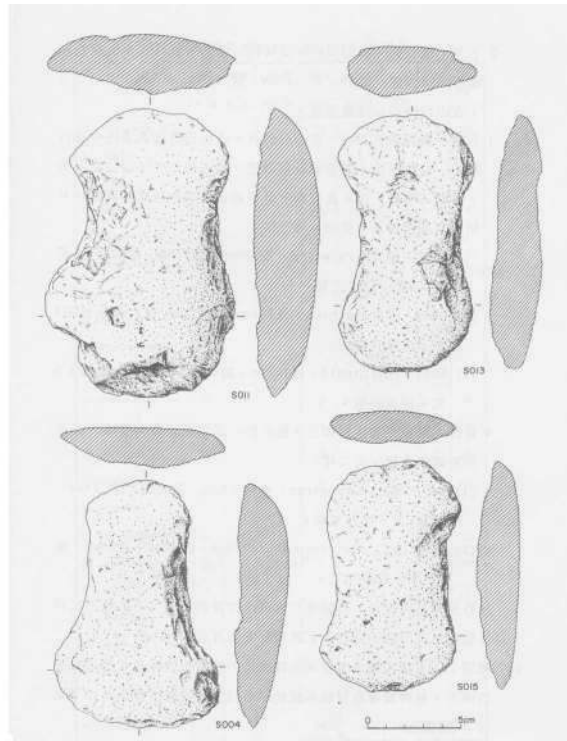
蘭嶼 (Lanyu) Jikanyuan
(米澤容一 19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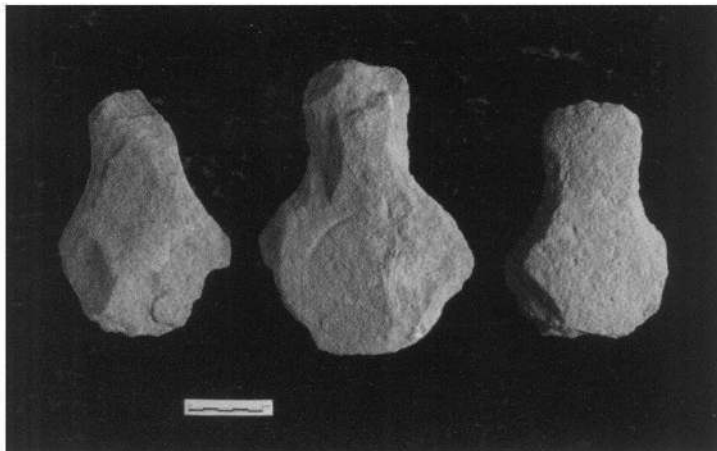
卑南 (Peinan)
(葉美珍 1984)

圖3. 蘭嶼出土的陶器與台灣東海岸卑南遺址、舊香蘭遺址出土陶器的比較。

Ceramics found on Lanyu as well as from the sites of Peinan and Chiu Hsiang-lan on the east coast of Taiwan.



蘭嶼 (Lanyu)
(陳仲玉等 1989)



舊香蘭 (Chiu Hsiang-lan)
(李坤修 2005)

圖4. 蘭嶼及舊香蘭遺址出土之束頸(腰)打製石斧。

Chipped stone axes from Lanyu and the Chiu Hsiang-lan site.

至於蘭嶼與巴丹群島史前陶器之類緣關係為何？由於過去所發表有關巴丹群島的考古資料甚為稀少，尚難與蘭嶼作一比較。不過，日本熊本大學Koomoto（1983）所發表之巴丹島考古調查報告指出：巴丹島史前遺址之陶器有菲律賓和台灣之類緣。最近，Peter Bellwood（見本刊文）在巴丹群島之考古工作，也指出在其所發現Sunget期（3600-2500 B.P.）遺址所出土之陶器中，明顯具有與台灣東海岸富山文化和卑南文化，以及呂宋島北部新石器時代文化之類緣關係，可能代表台灣古代的南島民族開始經過巴丹群島向菲律賓移民。所以，如果這一推測正確，則介於台灣東海岸和巴丹群島之間的蘭嶼，其史前文化的源頭，自應朝向台灣。

蘭嶼所發現的石器中，以石斧為數最多。陳仲玉等（1989）在蘭嶼共採集到61件石器，石斧即佔了47件，可分為束腰型（或稱砦碼型）、束頸型（或稱有頸型）和束柄型（或稱有柄型），其中束腰型石斧更是蘭嶼石器的特色。鹿野忠雄（宋文薰譯 1955）認為這種石斧的分佈，從蘭嶼「經過綠島而普及於東海岸，其若干一直達到西海岸之南北兩端。」最近的一些考古研究，在卑南（連照美、宋文薰 1986），花岡山和鹽寮（葉美珍 2001），富山、石牌橋和前寮II（劉益昌2000），以及舊香蘭（李坤修 2005）等遺址都分別發現了束腰、束頸和束柄型的石斧（圖4）。但是這些類型的石斧卻完全不見於巴丹群島。這項明顯的證據，也更強調了蘭嶼史前文化中的台灣類緣關係。

討論與結語

蘭嶼島上的人或文化都是來自於巴丹群島的這一說辭，雖然幾乎是異口同聲，然而以目前的考古資料，包括甕棺葬和陶、石器的類緣關係來看，似乎還有商榷的餘地。由上述的討論可知，近代的雅美人從語言和文化上來看固然不能排除是晚近從巴丹島移民而來的可能性，但是我們也不能忽略一個考古資料所反映的事實：蘭嶼島遠從4000年以前的繩紋紅陶時期開始，即已有人從台灣本島前來活動，以後從3000多年前開始，卑南文化的人除了到達蘭嶼和綠島，也可能繼續向南延伸到巴丹群島，而花岡山文化的甕棺葬俗也可能影響到了台灣外海的綠島和蘭嶼，並持續在當地發展成為鐵器時代的甕棺葬文化。筆者推測，蘭嶼和巴丹島的史前居民至遲在三千年前可能共同來自於台灣的東海岸。這些人群的全部或部分，有可能即是今日蘭嶼和巴丹島民的祖先。

這樣的推測也可以從雅美人的祖先來源傳說和遺傳學的研究結果，獲得一些支持。余光弘和董森永（1998）指出，蘭嶼雅美人的祖先來源地傳說，其實並非都是指向海外，也有的傳說是指向起源於島內。而以馬偕紀念醫院林媽利教授為首的研究團隊，也對蘭嶼、巴丹和台灣本島的原住民進行血液和DNA的研究，企圖從遺傳的因素中探討他們彼此之間的關係，並逐步有了一些成果。朱正中、李慧玲和林媽利（2002）即利用組織抗原系統探究達悟人與巴丹人的親緣關係：「在達悟族中有些haplotype並未見於巴丹人中反而可見於台灣原住民A*1101-B*1525、A*2402-B*130、B*1301-DRB1*1202等。此類haplotype可能原存於巴丹族群，但因遺傳漂變或其他族群的遷入而消失，但也可能是由台灣本島傳入於蘭嶼的達悟人中，或在巴丹人移入時已有台灣本島原住民已居住於蘭嶼島上所遺留。」

雅美人的祖先在發展過程中，顯然並不是孤立的；在鐵器時代以後，他們與北方的台灣和南方的

菲律賓、巴丹群島一帶，持續有所互動往來。在蘭嶼，伴隨甕棺所出土的玉飾、玻璃珠、玻璃手環、瑪瑙珠、金飾和中國瓷器等，都非本地的產品，而是分別源於台灣本島和東南亞一帶⁽²⁾，清楚顯示了當時蘭嶼與周遭地區互動交流的情景。在此互動交流的過程中，自然也可能形成人群間之遷移或混和。

總之，就目前之證據來看，有關蘭嶼雅美人的祖源，絕非巴丹群島一地所能涵蓋。其間可能涉及複雜的歷史過程。但是由於資料仍然貧乏，要進一步釐清這個謎題，還有待考古學家繼續努力。

引用書目

大野延太郎

1901 台灣石器。《東京人類學會雜誌》第180號，頁223。

安倍明義

1993 東台灣的遺跡に就いて（一）、（二）。《台灣教育》366:65-71、367:49-57。

朱正中、李慧玲、林媽利

2005 由組織抗原系統，看達悟族人與巴丹人的親源關係。《南島民族世紀首航暨海洋文化國際論壇會議手冊》，頁27-33。

朱正宜

2002 文化遺址在南科園區。《南瀛藝文》183期。

米澤容一

1986 台灣、蘭嶼の考古學踏査（一）。《えとのす》第32號，頁110-116。

1984 台灣、蘭嶼の考古學踏査（二）。《えとのす》第32號，頁148-149。

余光弘、董森永

1998 《台灣原住民史—雅美篇》。台中：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宋文薰（連照美譯）

1980 臺灣蘭嶼發現的石製雕刻品。《故宮季刊》14卷3期，頁39-52。

(2) 鹿野忠雄曾從雅美人獲得一件類似玉質之山羊小雕像，此外他也曾在蘭嶼朗島村發現軟玉質之玦形耳飾，國分直一同樣也在該村發現有角玦形耳飾。關於這些石質和玉質飾物的來源，鹿野忠雄（1946a）及宋文薰（1980）皆認為是由呂宋、經巴布煙、巴丹群島北上而來的文化要素之一。最近的一些考古資料顯示，早在兩、三千年前，台灣東海岸的卑南文化，不只是已經跨海到了綠島和蘭嶼，其玉器並且可能流傳到了菲律賓一帶（洪曉純 2003）。上述鹿野和國分所發現的玉器是來自於台灣東海岸？還是另有來源？尚待進一步研究。

李坤修

2005 《台東縣舊香蘭遺址搶救發掘計畫期末報告》。台東：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河村只雄

1939 ヤミ族の石斧。《南方文化の探究》。創元社發行，頁205-206。

金關丈夫、國分直一著，譚繼山譯

1990 《台灣考古誌》。台北：武陵出版公司。

洪曉純、飯塚義之、Rey A. Santiago

海外遺珠——一顆菲律賓出土的史前臺灣鈴形玉珠。《故宮學術季刊》第21卷第4期，頁43-56。
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徐韶謨

2003 蘭嶼椰油村蘭嶼國中籃球場遺址調查報告。《2003蘭嶼研究研討會》中央研究院民族所蘭嶼研究群、台東大學。

國分直一

1981 《台灣考古民族志》。東京：慶友社。

連照美、宋文薰

1986 《卑南遺址發掘資料整理報告第三卷，遺址堆積層次及文化層出土遺物之分析研究》。台北：教育部、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系。

陳仲玉、楊淑玲、高韻華

1989 《蘭嶼考古學初步調查》。內政部營建署委託，中華民國自然生態保育協會調查。

鹿野忠雄

1946a 紅頭嶼とバクン諸島の交渉と其杜絶。《東南亞細亞民族學先史學研究（上）》，頁35-55。東京：矢島書房（1995 台北南天書局一版發行）
1946b インドネシアに於ける甕棺埋葬。《東南亞細亞民族學先史學研究（上）》，頁82-112。東京：矢島書房（1995 台北南天書局一版發行）

鹿野忠雄著，宋文薰譯

1955 《台灣考古學民族學概觀》。台中：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葉美珍

2001 《花岡山文化之研究》。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專刊第六號。台東：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2005 《卑南遺址石板棺研究——以1993-1994年發掘資料為例》。台東：台東縣政府，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臧振華

2004 《臺南科學工業園區道爺遺址未劃入保存區部分搶救考古計畫期末報告》。南部科學工業園區委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執行。

臧振華、葉美珍

- 2000 《臺閩地區考古遺址：台東縣》，臺閩地區考古遺址普查研究計畫（第四期）。內政部編印。

劉益昌

- 1996 《台灣地區地方人才培訓班第二期第二階段田野課程田野調查暨田野發掘實施報告》。行政院文建會主辦。

劉益昌、顏廷仔

- 2000 《台東縣史前遺址內涵及範圍研究—海岸山脈東側與綠島》。台東縣政府委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執行。

劉益昌（主編）、陳俊南、顏廷仔、林美智、藍敏菁、陳思嘉、陳雪卿、陳惠君、雷娃慕秋（編纂）

- 2002 《台東縣史前遺址——台東平原以南及蘭嶼地區》。台東縣政府委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執行。

劉斌雄

- 1959 蘭嶼雅美族喪葬的一例。《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8期，頁143-183。

Asai, Erin

- 1936 A Study of the Yami Language: An Indonesian Language Spoken on Botel Tobago Island. Leiden: Ginsberg.

de Beauclair, Inez

- 1969 Field notes on Lan Yu (Botel Tobago)。《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3期，頁101-116。
1972 Jar Burial on Botel Tobago Island. Asian Perspectives XV:167-176.

Bellwood, Peter and Eusebio Dizon

- 2005 The Batanes Archaeological Project and the "Out of Taiwan" Hypothesis for Austronesian Dispersal. Journal of Austronesian Studies, 1(1):1-33.

Benedek, Dezso

- 1991 The Songs of the Ancestor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Bashiic Folklore. Taiwan Aborigine Monograph Series 2. Southern Materials Center, Inc. Taipei.

Ferrel, Raleigh

- 1969 Taiwan Aboriginal Group: Problems in Cultural and Linguistic Classification. Monograph No. 17,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Taipei.

Koomoto, M.

- 1983 General Survey in Batan Island. In Batan Island and Northern Luzon—Archaeological, Ethnographical and Linguistic Survey. University of Kumamoto, Faculty of Letters, Japan.

Leach, Edmund R.

- 1938 Stone implements from Botel Tobago Island. Man, vol. 38, pp. 161-163, London.

Solheim, Wilhelm II

- 1960 Jar burial in the Babuyan and Batanes Islands and in central Philippines, and its relation to jar burial elsewhere in the Far East. *Philippine Journal of Science* 89, part 1:115-48.

Stamps, Richard B.

- 1983 Jar Burial from the Lobusbussan, Orchid (Botel Togabo) Island. *Asian Perspectives* 23(2):181-192.
-

On the Origin of the Yami People of Lanyu as Viewed from Archaeological Data

Cheng-hwa Tsang

National Museum of Prehistory

Lanyu (Orchid Island) lies off the eastern coast of southern Taiwan, about 90 km south-east of Taitung. There are nowadays about two thousand Yami (now called Tao) people inhabiting on the 45.7 square-kilometer island. Like the other indigenous peoples of Taiwan, the Yami people speak the Austronesian language. Based on the linguistic similarities and their own legends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Yami people reached Lanyu by way of the Batanes Island, which lies in the Bashi Channel midway between southern Taiwan and the northern Philippine island of Luzon.

But current archaeological data have shown that this point of view presumably needs to be reconsidered. It has been suggested by many scholars that the jar burials, which have been found several on the coast of Lanyu and dated around 1200 B.P., may represent the Yami people's ancestral tradition of burial practice originating from the islands of Batanes. This suggestion is made mainly because of that jar burials were found both on Batanes and Lanyu and their forms are basically similar to each other. In recent years, however, more and more prehistoric jar burials were found in Taiwan, especially on its east coast. For example, the jar burials were unearthed from the Huagangshan site of the Hualien County and the Wanshan site of the Yilan County. The forms and practices of these jar burials are similar to those found on Lanyu and Batanes, but their dates are apparently earlier. Therefore, there is an alternative possibility that the jar burial tradition on both Lanyu and Batanes may have eventually originated from Taiwan.

This possibility may be further supported by the accumulating archaeological information on Lanyu. So far, three prehistoric cultures have been identified from the artifacts collected by different archaeologists on Lanyu. They have been labeled as "the Yami Culture", the "Peinan Culture" and the "Fine Corded Ware Culture". Although no concrete stratigraphic relationship among these 'cultures' were found, the styles and forms of some of the potsherds and stone tools found on Lanyu are undoubtedly identical to those found at the sites of Fine Corded Ware Culture, Peinan Culture and Huagangshan Culture of the east coast of Taiwan.

It is postulated based on the current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that we can not completely rule out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modern Yami People came from the Batanes

Islands, but we can not neglect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east coast of Taiwan was probably a common homeland for the ancient inhabitants of both Batanes and Lanyu, who were totally or partially the ancestors of the modern Yami people.

In addition to th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two other lines of clues are worth to be mentioned:

1. Although some of the Yami legends indicate the islands of Batanes were the places from where their ancestors came, still others, on the contrary, tend to point out a Lanyu local origin.
2. The results of the recent analyses on the HLA system of the indigenous people of Batanes, Lanyu and Taiwan have shown that some hypotypes of the Yami people can be seen among the indigenous people of Taiwan, but not of Batanes.

In conclusion, based on current available evidence and the related clues, we can be aware of that the island group of Batan is by no means the sole place from where the ancestors of the Yami people originated. The peopling of Lanyu would have involved a long time and a complex process. In order to clarify this question, we need to explore more evidence and to carry out further research.

Key Words: Lanyu, Yami, Tao, jar burial
